

吳稚暉新傳 (本文插圖刊第八頁)

——不是完人·士的新典型

● 趙淑敏 (東吳大學教授)

不適正經受人膜拜

吳稚暉原名吳眺，光緒二十四（一八九八）年戊戌變法失敗後，感覺讀古書對救國沒有幫助，與朋友共約，不再讀線裝書，並改名為「吳敬恆」。因為認為人若缺乏「敬」與「恆」之心，便不足擔負以天下為己任的重責。生於清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年，逝於民國四十二（一九五三）年，人生歷程共八十九寒暑。二十三歲中秀才，二十七歲中舉人，參加乙未會試仍未第，適逢康有為聯合各省舉人公車上書，亦曾列名其上。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年，時任教於北洋大學堂，與康有為初會於北京，論及當時中國亟須變革之大害，康以為最需改革的是「女人裹小腳，吸鴉片，考八股」，吳稚暉所見相同，此後實踐己諾，遂未曾再參加科學考試。不過此時的吳稚暉仍為舊時代的士大夫，並無革「命」思想，因此對戊戌變法的評語乃是「要保住這條辮子」。依然認愛國必須忠君。

後任教上海南洋公學三年，赴日留學入日本高等師範學堂，因清廷駐日本公使蔡鈞拒絕擔保

學生入成城學校事，率學生前往爭論，最後為日警所拘捕，驅逐出境。深覺士可殺不可辱，曾跳皇宮護城河自殺，諫未死，由蔡元培護送回國。此時思想已變，從改革維新而激烈革命。成立愛國學社，發起張園演說會，蘇報案發生，為避禍出走英倫。民前七（一九〇五）年，與中山先生於倫敦相見，並於是年冬終於排除心理障礙加入同盟會。一九〇七年在巴黎創革命宣傳雜誌「新世紀」週刊，共出一百二十一期，不堪賠累於一九一〇年停刊。一九一一年，辛亥革命爆發後，國父孫中山由美至英從事外交活動，吳稚暉共研未來建國大計並襄助文件的草擬。民國元年中華民族成立，終其生吳稚暉護持中華民國政府不遺餘力，但從不曾出任官職。

寫前代學人風範，似乎都應持最嚴肅的心態，用最嚴肅的筆法著墨，但是對吳稚暉卻難下筆，因為後人雖將之奉入廟堂，吳稚暉卻絕不適成為廟堂裡的牌位。儘管政府所頒的褒揚令與許多紀念文字裡皆稱他為「一代完人」，然而於研讀他留下的數百萬言的文集與他人所著行誼記事，覺得這四個字實在太籠統而不切實際。吳稚老一

向是非常人性化也小民化的，我國歷來推崇「完人」，都是將人性弱點修練得一點沒有，可以板起面孔端坐廟堂的人物。吳稚暉不是，他從不會也不屑去斧鑿自己的真性情，使符合世人心目中「偉人」「夫子」的標準。比如早年他曾看到一本小書「何典」，開頭便是「放屁，放屁，真正豈有此理」的句子，就欣賞已極，此後直到去世，他的大作泰半都是這樣的文法。他的特立獨行，善善惡惡發揮天然至性於談諧之間，活到八十九歲，豎立起「士」的新典型，使人可以喜歡他，但絕對不適合一本正經地膜拜他。

雖有氣惱從不氣餒

很多研究吳稚暉或崇敬他的人，都常常會提到那篇刊出於民國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三月上海「太平洋雜誌」的長文——「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」——來觀察他的人生觀與宇宙觀。這篇全長七萬餘字的大文，主旨在與胡適、張君勱、梁漱溟、梁啟超等人爭論。據吳稚暉言對當時科學玄學之戰停戰有功，當然是重要文獻。事實上吳稚暉一向喜歡長篇大論，一如他與相交的

朋友學生晚輩談話一樣，習於反覆以他的「吳氏文法」剖析，讀者必須集中精神閱讀，才可歸納出精髓。他常用俏皮玩笑的筆調詞彙，分析大道理大事物，所以胡適之在民國十七年撰「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」一文，曾經譽之為中國近代的大思想家，與清朝的顧亭林、顧元、戴震並論。審讀吳稚暉全集，會承認這樣的說法；雖然吳稚老甚愛以「嚼蛆」形容自己的言論，但是常在許多至俚俗的話語中，闡述智慧的哲理。不過不宜引述，假如想在這裡引據，真得好好做一番所謂的「文抄公」。但是有幾句非常簡單的話，卻很容易說明他的人生觀。

「總之，人的天職不但是在保存，而且是在創造。從前我年輕的時候，天天做著八股文，後來就這樣跳了跳，直到現在，愧未能盡造物的責任。不過我們所應當留意的，就是不要一勞永逸。反過來說，也不要因噎廢食，更不要活不耐煩。總是「造」要緊」。

這些看法，對於吳稚暉以創造為人生目的之一的哲學，做了一個很好的歸結。綜觀吳稚老一生行事，他非常勇於任事，有很多的理想，心裡有好多點子，想想還不夠，還急著要付諸實行，就是要創造新猷。不錯，常常產生多錯的結果，給他自造成不少困擾。但是他縱使會有短時的氣惱，卻從不氣餒，然後再出發做另一樁他該做的事。在舊時代八股先生出身的人士裡，他是很難得的了，肯於認錯否定以前的自己，改變很多原有的思想與觀念。可是也有永不改變的生活習慣和讀書人的禮數與作風。另外永遠改不了的

是他的性格。吳稚暉出身寒苦，長於外家，都過的是最貧窮的日子。在歷史上看見有些受過辛苦的歷史人物，即使成功發達，舊時的遭遇則常在心裡留下陰影，表現在立身處世上，甚而成為人格的缺陷。在這一點上，吳稚暉的心理十分健全，雖受過難堪的窮困，卻沒被貧窮所困所傷。僅僅是保留了很多童年的生活習性，如喜歡身居市井的熱鬧，衣食住行力求節儉簡單。也許還超過儉省，見過與追隨過他的人就說他的大禮服馬褂紐絲從未扣全過。而抗戰時期會居「斗室」，房間僅十二尺見方。當時「中央」曾建屋給他居住，他以不慣容易生病婉拒，並撰「斗室銘」以誌心懷：

「山不在高，有草則青；水不在深，有聲則清。斯是斗室，無庸德馨。談笑或鴻儒，往來亦白丁。可以彈對牛之琴，可以背臘痢之經。聳聳草際白（指出野恭者），糞味夜來騰。電臺發癩團之叫，茶客擺龍門之陣，南堆交通煤（交通部），東傾掃蕩盆（東壁掃蕩報館營業部時傾盆水）。國父云：「阿斗之一」，實中華民國之大國民」。

分析吳敬恆的性格，從資料中了解，可以說有相當的衝動的成分；雖勇於出頭，礙於現實每不得不虎頭蛇尾。

但綜觀其一生，確實有許多見解，是屬於真正「大」人物的胸襟，足為後世所紀念法式的。至於他特重親情，很照顧親戚、鄉人和學生；尤其關心「老百姓」與窮人的福祉權益，反倒不值特別強調了。

偶見「何典」得到啟示

吳稚暉直至把名字從吳昶改成吳敬恆，還是十足的冬烘先生，沒有任何民主的思想。他七歲啟蒙讀的是古書；十八歲開館授徒，教的是古書；二十三歲中童子試，考的是八股制藝；二十五歲考入南菁書院深造，鑽研當然是古典舊籍。到二十七歲中學，二十八歲初次入京會試，接觸了更廣大的世界，但吳稚暉的個人世界並無改變。乙未，三試未第，正逢國事蠅蟻，參加了公車上書，有促請變法的意念，然而孫中山先生第一次起事廣州，卻以為無非又是一次「洪楊之亂」。僅是偶見「何典」，得到「妙句」，因而改變了文風而已。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說，這是他步向革命急先鋒的第一步。到康有為創辦強學報用孔子紀年，梁啟超又在上海辦時務報，議論聞所未聞，承認他們是不得了的維新黨，多少受了點暗示，跨過了這第二步。再過年餘，北洋學堂放年假，他到北京去，第一次也最後一次見到康有為，論及中國之害，康有為所提出的八股、小腳、鴉片，吳稚暉表示可以自動不赴考等等，從此也確實不再考過，絕棄了個人晉身之階。這種態度應當是在入南菁書院那年，在山長黃以周牆上的座右銘「實事求是，莫作調人」，引為警語，自此奉為圭臬的實踐。同時受了康梁的影響，竟寫了個三千多字的摺子，於戊戌的大年初一攔了左都御史瞿鴻禨的轎子遞了上去，瞿鴻禨看了，也接御史瞿鴻禨的轎子遞了上去，然而仍然不折不扣的傳統舊時代學者。

第四步，仍在北洋大學堂任教，北洋學堂卻是新思想培育的搖籃，吳稚暉自以為已經新得不得了，可是一次出個作文題「率土王臣義」，不料學生都寫的反面文章，氣得他的「吳臆評曰」大大地批駁，認「拾西國亂黨之餘唾，作謀瓜者之佞鬼」此種議論，其毒皆中於民主、民權之說。「爭議到總辦王修植處，不意總辦也認為他的看法不對，提出孔孟的例子，不得志於聖君，則有去國之義。如此，再也呆不下去，便辭職南歸到南洋公學教書，而心中仍憤憤。待康梁在北京變法，以維新黨自居當然興奮，然而仍認為此舉在保住辮子。

第五步，受了庚子事變的刺激，要組織學生軍不成，次年又主張教師學生共同治校亦不成，遂到日本求學。應邀到廣東籌辦廣東大學堂，看見官場，格格不入，再赴日本，恰巧孫中山先生也在日本，鈕永建邀同往拜訪，心理上的阻礙使他婉拒往見。發生被逐事件回國後，在上海加入了中國教育會，又成立了愛國學社，之後才由「第五步」到了「第六步」，於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正月，正式倡言革命。

不斷自我脫胎換骨

吳稚暉很坦白地承認，在北洋學堂作文事件後五年，原來認為天經地義的事，完全等於「放屁」。事實上才過一兩年，已經知道不對。而且在加入中國教育會之前，也已經喊出了三句口號：「皇帝與百姓打官司，我助百姓；先生與學生打官司，我助學生；老子與兒子打官司，我助兒

子。」主張師生平等。由吳稚暉的自敘，他是很敢於承認自己昨日錯誤的人，不怕否定過去的自我。由環境的教育接受新的觀念，使自己不斷地進步脫胎換骨，不會為虛矯的面子妥協，模糊他確定不疑的是非。不過由於性格使然，對於他認為正確而有理的，會擇善而固執。比如他無數次地表明，燒成灰還是國民黨；繞成灰，還是無政府主義者；原本不屑與中山先生見面，待國父到英倫主動折節結交，互相真正認識以後，就成為中山先生最最忠實的朋友，不論在什麼逆境對中山先生建立的民國護持到底。

以前，很多很久，凡提到吳稚暉，都儘量不談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事實。這是一種很奇特的心理，正似某些人士一談起他，只會很敏感地指出他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，卻忽略吳稚暉其他的思想觀念以及事業和貢獻。推敲原因應該有兩個，其一，是吳稚暉常常要分辯的，無政府主義常被「作成了較低主義的共產黨去生吞活剝」，另二，恐怕就是認為無政府主義是反現有政治體制的，不宜強調鼓勵。

目前可以看到有關吳稚暉最早討論無政府主義的文獻，應當是民國前四（一九〇八）年發表於「新世紀」第五八號的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「無政府主義可以堅決革命黨之責任心」，他提及民族主義的革命會成為復仇革命，共和革命僅是過渡，最終是大同革命，便是無政府主義的境界。「無政府時代雖決無統治之組織，亦不能無關連之組織。欲取關連之組織，非一時可臻於完備。至於無政府黨先欲剷除君主，消滅國界，此實行

之期，必不在遠。君主之應剷除，先於道德上被認為無有尊貴名分（五倫中君父同尊，人知其謬），復於政治上被認為無有責任之資格（此立憲黨之所能言）。故一經無政府黨起而為彼等直接之對頭，斷然可望其絕跡於二十世紀之中。苟使中國人而洞知此義，則君主一層之理障，可以全撤。於是推倒滿洲政府，固當毫無遲回。即建設共和民政，自必日為平常矣。所以欲堅決革命之責任心者，莫若革命黨皆兼播無政府主義」。

所以要引如此長一段原文，就是便於對吳稚暉輩的無政府主義，可以了解其原義。他們不要的是統治性的政府，那麼君主當然得先剷除，共和必須經由，最後有個大同世界。斯時仍要有個「關連之組織」。在蘇報案發生後，他不得不亡國外時，好友陸爾奎資助他費用，因法國為革命的溫床，不許他赴法，要他去英國。然而由英而法的吳稚暉在那樣一個大環境「進修」，受著國內外思潮與現實的激盪，會醞釀出一種自己的理想國，不足為怪；或者可以說他的理論太烏托邦，不切實際，但有那樣理想，毋寧說是一種對中國歷史與時局極必反的回應。

或許由於對於他的理想，說得太粗糙，不久又寫了一篇，發表於同年的九月十九日「新世紀」第六十五號，題為「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為革命說」，認為「革命者，破壞也」，而政治革命以抗爭權利為目的，革命一起，易生革命暴徒；開始奪權於少數強權之手，繼而互相爭奪，肆為屠戮。公德乃教育的極則，有教育與無教育之別，就可以毫無公德心與富於公德心為斷。政治革命

激起於權利；權利者，適為公德之反對。「革命與教育離為二，故其惡果必有所不可逃」。「無政府主義者，主要在喚起人民的公德心，注意於個人與社會之相互，而舍棄一切權利，謀共同之幸福，此實講教育，而非談革命也」。吳稚暉在「新世紀」上的文章，常常用最潑辣俚俗的字句筆法，但談及他的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時候，倒真的一本正經。自然世人可以批評不夠成熟，甚至「一廂情願」，然而卻可看清他最基本的無政府主義究竟講的什麼。

身體力行八不原則

辛亥革命成功，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了，有些革命先進進入政府，就似吳稚暉對表侄陳源所說：「革命黨得了志，他們的面目全變了。始終保持著本來面目，沒有染著一些官僚習氣的，只有寥寥幾個人，尤其是孫中山先生。」而吳稚暉祇去南京做過中山先生的客人，絕沒去任一官半職。不但如此，四月下旬，上海同盟會開會，吳稚暉、李石曾、蔡元培、張人傑、汪精衛等幾個在法國常相過從的朋友發起了「進德會」，也有稱之為「八不會」的。「進德會」的會員，並不都力行「八不」原則，所謂「八不」就「不賭博、不狎妓、不置妾、不官吏、不議員、不吸煙、不飲酒、不食肉」。有人可以「三不」「四不」「六不」，吳稚暉與李石曾都決定「八不」，吳稚暉除了抗戰勝利後被鄉人「強迫中獎」讓而未成，當選了國大代表，那八不大體上是身體力行的，而絕不肯出任官職，包括國立大學校長。民國

十三（一九二四）年五月十五日，有「致華林書」說：

「不過我們自己加上一個無政府黨名目，我們自己戒救了自己，止幫他革命，不幫他們升官、發財罷了。」

這是為無政府黨加入國民黨的說明，止幫他們革命不幫國民黨人升官發財，更不用說他自己。不過也對人表示，官是不做的，國事則是要關心的。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，各方紛傳他將繼任國府主席，不勝其擾，乃寫了一篇短文否認：

「言乎公，小人忝竊大名，必使世界譁笑，愛國豈可辱國？言乎私，犁牛忽披文繡，定將餘年犧牲，惜身不應殺身。」

復次，燒了灰，還是國民黨；燒了灰，並是無政府主義者。下自委任末級，上至國府主席，凡屬政府官吏，決不為者，李石曾唱於前，我亦隨其後。已往之歷史可證也。何必亂造謠言？」

他的姪孫女吳續新曾言，其叔公的長處是不做官，因吳稚暉對一切都大而化之，如果做官，也一定是個昏官。對於吳稚暉的性格分析，一語中的。吳稚老有很多優點，行政能力和縱橫捭闔的才具卻未見高明，假使他也像很多「當仁不讓」的「人傑」一樣，官癮大發，爭權奪位，惟恐官小，將會產生什麼樣的負面影響？稚老不肯為官，是否多少有點自知之明的成份？依他的性情，即使並非無政府主義者，也不會出任官吏。

吳稚老之所以成爲一個終身無政府主義的信徒，是對各式政府政治的失望，遂訂了一個高標

準，遙不可及。因而一再修正，到了民國十六（一九二七）年初，便常說要三千年後才能實行，後來又說要等到兩萬年以後，其含意即是難於實施，不切實際。就像老子倡言「清心寡欲」「無爲而治」，須多麼高尚品質的人類，才能達到這個境界？因此吾人縱或嚮往，也僅能盼望，卻無法希冀實現吧！

不過人可以言笑吳稚暉無政府主義的妄想，卻仍得承認非暴力，教育，公德，世界大同，不爭權利，是真正關心人類天下爲公無私的胸懷。

推行國語同音運動

小學一年級的孩子，用董稚的語句，在作文簿上發表了他們的感想，記述了他們的生活起居，也讀過了改寫的「西遊記」、「水滸傳」。

廣東籍的男士，山西籍的女子毫無困難地用言語表達了愛意；廈門青年和漢口姑娘因「相談甚歡」進而走上了紅色地毯；台北少年和北京兒童唱同樣歌詞的流行歌曲。

遠遊異國多年的遊子，在家信中忘了國字的正確寫法，畫了一些符號代替，家人明白了「丫一廿」和「ㄨㄨㄨㄨ」，及時地寄出了茶葉和桂圓。

這些都是常見的情形。說起來，全該感謝「注音符號」——若干年前被稱爲注音字母——的東西。大家使用久了，沒什麼稀奇，不把它當一回事；某些自命德高學博之士，常鄙夷它的存在，否定它的功能；一些心理有所病變的人士，更敵視它的作用與成就。但是任何人祇要不泯滅理

性和良知，便不能抹殺它發展基礎教育，普及國民知識，溝通同胞感情的貢獻。就像很多人僅記得秦代有個暴虐的秦始皇，卻忽視了「書同文字」對中華民族的重要。設想各地南腔北調，又文字各異，國人同胞之間，交通無路，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景況，幸虧有些先知先覺者解決了這個困難。

千百年前，中國就有這樣的問題存在，但很少人去注意。由於幅員廣大，山川阻隔，交通不便，中國早就存在語言複雜、人民思想溝通不易的現象。加上傳統社會封閉保守，習慣安土重遷，過著簡單自然繁衍後代、完糧納稅不問外事的日子，一村一世界，無共通語言也許並非嚴重的事。但仍造成狹隘的地域觀念，錮塞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，甚至盲目排「外」，造成衝突。再者，因為言、文之間有著距離，使得教育難以普及，使中國幾乎成愚民社會，待有外力衝擊轟開大門，民智不足，即成了無法自富自強的弱點。於是有人心遂想到了「讀音統一」與白話文運動。在這些方面吳稚暉都是先驅者。

早在光緒二十二（一八九六）年，吳稚暉到蘇州陳家為西席，家人不識字，通信困難。當時每天用餐必有豆芽菜，心中實在厭膩，但也因此得到靈感，乃依康熙字典的等韻，創作了一套拼音字母，稱之為「豆芽字」教授夫人親友，用無錫土音拼音彼此之間通信。待他流亡倫敦的時候，更正面注意到這事，一心一意想找出一樣可用的工具，幫助「粗俗」的人接受教育。而「新世紀」週刊上的文章，常常以最市井的口語撰文以

收痛快之效，甚且用到比國粹的「三字經」更大衆化，是白話文推行的具體實踐，在「新世紀」上他特別闡明主旨以祛衆疑，並不要做「倉頡第二」，所要創造的是注音字母，統一讀音，亦「可以為至粗俗不識字人之交通工具」，且已有具體概念。很多都說吳稚暉發明了「注音符號」，實事求是的他絕不承認這一點，他並非發明，祇是努力倡導。民國元（一九一二年）蔡元培為教育總長，邀請數十位各方碩彥，到北京組成「讀音統一會」，吳稚暉被選為議長主持此事，雖然後來他受不了許多專家先入為主的成見與自我膨脹的氣燄而去，卻哀告工作一定要完成。會議也確實繼續舉行，共審定了六千五百餘字的國音，加上當時俚俗通行及學術新字六百餘。政治儘管擾攘，國語逐漸在各地區實行，注音字母在民國七（一九一八年）十一月部令正式公布。吳稚

老因讀音統一會決議輯成的「國音彙編草」交部存案，而未頒布，於是發憤增訂為「國音字典」，民國八（一九一九）年交商務印書館印行。民國十七（一九二八年）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成立，再加重修，改編為「國音常用字彙」，二十一（一九三二年）五月教育部公布。台灣光復後推行國語用的「國音標準彙編」就是此書。而標準音取北平音的原因，因「北音久作官話」

「北平音，其最大優點，有活口，可隨時到北平將全數之字，不出城門而校定」。「尤其北平音久已為世界所默認，且為全國社會人士所愛聽，得心理上之大贊同」。

推行國語，比制定國音遭遇的阻力更大，今

天能看到的許多文獻，皆是吳稚暉與各方討論爭辯的文字，他叫得聲嘶力竭，要為「灶婢廝養」爭取一種自修的工具；要為二百兆不識字的平民大問題找解決的方法；要為中國人找一雙無處不可至的「草鞋」，達到統一國語，方便婦孺目的，以普及全民教育。因為「識字而不連同注音符號，就無異把數千年聖聖相傳的艱難文字，擺起臭架子，開頭先打民衆一陣殺威棍」。

從推行語同音的運動，終吳稚暉的一生都是急先鋒，就這一點，這位前輩先生確實是有大識見無私的先知先覺者。因為國語並非他的「母語」，他生於武進，長於無錫，一輩子說的都是無錫話，說不好國語。據他的學生說，連教英文，都是「無錫英語」。上台演講讓人明白，一半還靠「做工」。但是他並未為他一人一鄉，要求中國人都說無錫土語，倒吃苦受氣地大力推行國語。無錫話用之於私，國語用於公是很好的制衡，他就曾主張「注音符號」可注國語，也可注方言。這種識見可以讓想不通的人深思。

挫折頻頻培育青年

「別矣！這座很平凡的草台，要諸君唱出一隻很高的曲子，都珍重則個。」

民國十一（一九二二年）年，吳稚暉手創的里昂中法大學，由於一些自費生要求與廣東等省保送學生享受平等待遇，而掀起風潮，演出「二十八宿鬧天宮」的鬧劇。他十分氣憤，尊嚴受傷的吳稚暉留下字條在公告欄上，連夜悄然而去。雖

然他向來也不是忍讓無理的人，面對的畢竟是他寄予厚望的年輕人，所以僅是悄悄暗退。這件事近年有很多人為文記述，民國三十六（一九四七）年，曾為「二十八宿」之一的蘇雪林教授寫了一篇「一個五四時代青年的自白」，對此事件的前因後果描述得十分詳透。這篇文章乃是一篇懺悔錄，至少可以說是以自身的經歷向青年人所貢獻的見證。特別提到「青年人的正義感和熱忱是可以誤用的。」「自由權利之濫用，也是非常危險的——羅蘭夫人的「自由，自由，天下幾多罪惡，假爾之名以行」誠足令人警惕」。五四青年蘇梅為他的「在暴民政治裡翻筋斗過來」的經驗，做了忠實反省，才感到吳稚暉的包容。蘇教授說：「凡屬青年，都免不了要幹幾件糊塗事，吳先生雖屢次受我們之辱，卻始終愛護著我們。他回國以後，勤儉同學和里昂中法學校的同學還纏著他不肯放鬆，日夜包圍著他話絮，聽得他老人家看不耐煩了，登出一個活死人吳稚暉的哀啟，訃告全國，吳稚暉現在已經死了，你們不必再來尋他吵鬧吧。」

由這件因私人利益鬧起，後來竟忘其所以，自詡為「是一個極力與黑暗及不公道搏鬥的革命志士」，吳稚暉面對的方法是予以計較，最後吃不甘，也只是刊登一個自詠：

「寒門不幸，害及自身，吳稚暉府君，痛於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終北京，因屍身難得潰爛，權殮於空氣之中。特此訃聞。新鮮活死人吳敬恆泣血稽顙。」

吳稚暉用這樣的「幽默」表示了他的無奈。

可是，正似蘇雪林教授所說，他並未因此對青年灰心，拒絕與青年人打交道，仍繼續愛護青年，所以永不失「青年導師」資格。他的作風還是：「皇帝與百姓打交道，我助百姓；先生與學生打交道，我助學生；老子跟兒子打官司，我助兒子」。其實為勤工儉學的事，蔡元培、李石曾、吳稚暉已經焦頭爛額。學生嫌做工太多讀不到什麼書，中法大學的學生抵達里昂校舍的一天，陳毅、李立三等人就曾搶先去佔校舍。紛擾挫折還不止於此，該洩氣到底了，但是民國十四（一九二五）年又創辦一所「海外預備學校」，替他的黨同志盡一份育種培根的心。六十一歲的老者，帶著一羣十到十五歲的孩子，教他們讀書生活，又是一份吃力不討好，責任卻極重的工作。幸虧他教出一個蔣經國先生，否則極可能沒有人知道曾有過這所學校。不過經過採訪，確知吳稚暉非常操心地做他的「童子軍團團長」，既不握苗助長，又因材施教，還要容忍頑童的搗蛋。

總之，他注重教育，愛護青年，在北洋學堂時，為學生批閱作文，他會長篇累牘地評析；在南洋公學，告誡學生注重體操，主張不要查對寫「匿名帖」學生的筆跡；勤工儉學之議，所得僅有抱怨批評，沒得一點回饋；創中法學校，帶學生乘船出洋，為學生打掃甲板的垃圾，親身設計伙食的菜單，名為校長，沒拿過一文薪水，卻弄得灰頭土臉離開；推行國語運動，編字典還辦「國語師範學校」，訓練國語教育師資；再於不確定中辦「海外預備學校」；內憂外患頻仍的年月；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十二月十五日，北平

學生示威團到國民黨中央黨部，蔡元培、陳銘福被打傷，張道藩等中央委員主張扣留被捕學生，吳稚暉則和于右任堅決反對，學生被釋，由吳稚暉「恭送」到門外。過兩天南京學生又發動學潮，毀了中央日報，吳稚老又自告奮勇前往各大學與學生溝通勸告等等。看來似乎他專喜歡為自己找麻煩，但是從資料上看，儘管挫折頻頻，並不能打擊他的「好事」之心而使之氣餒，此後少攪些閒事。

科學救國留下省思

他主張科學救國；主張「中飯精蟲」的移民政策；維護中山先生建立的黨永做前鋒，這些都不討論了。另須說明的一點，許多人皆以為吳稚暉出身貧困，又不肯做官，一定永遠貧窮。事實並不如此，他為海內外敬仰的書家，各方求書太多，深以為苦，所以在民國三十二（一九四三）年七月十六日，徐悲鴻、張道藩等六人就給他登報訂出「潤例」，俾收「以價制量」的效果。可是沒想到，反而求者更多，收入極為可觀，但是他「擁護國策」，沒做保值的措置，辛苦所得，都存入銀行，法幣貶值，金圓券亦貶值，所以到台灣後，折合新台幣僅得一百四十二元。已八十數歲的吳稚老，在台灣仍舊賣字貼補生活，誰知存在第四信用合作社又成了倒帳。他為自己預結人生之賬時，倒賬賬目則註上「恰當」二字，絕未痛心疾首。後來又有少數進項，分別留給清寒的親戚，但在遺囑上寫了一句「生不帶來，死乃分配，可恥。」這才是他真正的想法。蔣經國



①作者（左三）與東吳大學同事及經濟系學生合影。

②作者（中）與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合影。



在所著「知勉錄」的做人篇引用吳稚暉的話，說
明人空手而來，也將空手離開人間。吳稚暉曾說

：「我離開人間的時候，不過多帶走了一條短

褲。」

吳稚老走的時候，不只多帶走一條短褲，還
有一套長袍馬褂和白襪布鞋。

他留下的倒不少，除了民國三十八年燬餘的

重要資料、著作、書法，還有一個啟發省思的典
型。這便是吳稚暉！

（本文許多註釋，因篇幅所限，省略未刊，
謹向作者致歉）